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94 期
2011 年 8 月 31 日

目 录

【论 文】

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晓霞

抗战时期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文化认同

——诗人黎·穆塔里甫的思想与创作研究

姑丽娜尔·吾甫力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新疆民族关系走向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李晓霞¹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 60 多年新疆的民族关系基本是和睦的，同时主要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仍明显存在，心理距离没有缩小。纵向看，族际关系的重要性和政治性在逐渐上升。在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中，政治因素是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首要因素。目前新疆民族关系的走向仍存在着不确定性，有平稳和谐型、分异敏感型、断裂冲突型几种可能。政策的有效引导将会导致其向平稳和谐发展。

新疆地处祖国西陲，是多民族人口构成的维吾尔自治区，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有维吾尔、汉、哈萨克 3 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 46%。新疆的民族关系成为影响区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权稳固，甚至是国家统一、国际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衡量我国民族理论研究、民族政策实践的重要指标之一，备受关注。

一、新中国成立后新疆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现状

民族关系是指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经济关系等。在我国，民族关系有几层含义，在全国范围，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间的关系；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还有自治民族与非自治民族间的关系；在社区村落，有聚居民族与散居民族的关系。

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之时，新疆主要有 13 个民族。以后许多来自内地省区的人口迁移进疆，目前新疆居民中共有 55 个民族成份。在这些民族中，人口数超过百万的有 3 个：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人口规模在 10—100 万之间的有 3 个：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人口数在 1—10 万之间有 5 个：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其他民族的人口都在 1 万以下。各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主要呈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相互交错杂处。

60 多年来，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在新疆得到贯彻执行，各族人民平等享有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等一切民主自由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自治民族享有管理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中央政府实施各种促进新疆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并动员组织内地省区支持新疆发展，以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之间以及各民族之间存在的差距。这一切为新疆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¹ 作者为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电话：15099067567；电子邮箱：xjwlxx@163.com

民族关系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往而出现的，混杂居住、一同工作为各民族间的密切接触提供了彼此相互了解、沟通的平台。长期以来，共同的社会制度、共同的政治经济组织、共同的社区生活使不同民族成员结成了同志、同事、邻居和朋友这样一些稳定的合作关系，彼此友好相处。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国内统一市场逐渐建立，新疆与内地之间，疆内各区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人口的流动愈来愈频繁，各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不断沟通交流，经济上相互的依存程度很高，各民族杂处的特征更为突出，多民族社区不断增多，彼此间的了解与友谊也大大增强。同时，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保守、封闭的思想观念，对与自我文化相异的“他者”的包容性增强，各民族文化中的共性在增多。因此，总体上说，60 多年来新疆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和睦的，表现为相互依存，共性趋增，共同发展。

同时，由于新疆存在的多民族格局，民族关系又表现出层次性的差别，在不同历史时段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民族关系的层次性差别指的是族际间的距离。受到历史、文化传统、人口数量及地理分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的存在着文化距离、心理距离的差异，表现为异族个体在交往中彼此接纳的难易程度。文化距离往往是文化现实差异的反映，也是一种心理建构的产物，而心理距离，是族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在心理中的投射。

以文化距离为例。60 多年来，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各民族在物质生活层面(衣食住行等)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外界的文化信息大量进入城镇乡村，形成文化共享态势；近年来大力提倡和推行双语，不同民族的交流障碍在减弱。同时，新疆主要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明显存在，民族界限清晰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是民族边界构成的重要因素，其中宗教，主要是伊斯兰教，对民族分界的区隔作用最为明显。伊斯兰教不仅作为一种宗教有着宗教教义、宗教仪式和宗教典籍，同时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伦理观念，对信仰者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对社会的影响方方面面。在新疆，各民族明显被区分为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与不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两类，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生活习惯等社会生活方面，都受着宗教的制约和规范。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又大多与使用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民族相重叠，这种宗教和语言的双重区隔加剧了群际间的文化差别，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距离明显不同。如果说语言的障碍可以通过学习来消除，宗教对彼此认同的阻隔作用却是不易减弱的。有学者指出的，在新疆，由于穆斯林生活方式较强的排他性，宗教信仰目前仍是不可逾越的一道民族边界、一道文化藩篱，有效地维护着传统文化的完整，同时也阻断了外来文化的影响。¹

文化共享的趋势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心理距离的缩小。在几个主要民族之间，如汉、维吾尔、回、哈萨克等民族，由于在文化包括认同方面的现实差异，一般在公共领域交往频繁，但在私人领域交往很有限，并表现出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的层次差异，不少人对异族人存有偏见心理，歧视行为也时有发生。

60 多年来的新疆民族关系演变历程，有两个时期被研究者们经常提到，一是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一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10 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被认为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严重损害了各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一段曲折经历²。但笔者经常听到新疆各族人士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民族关系很好，80 年代以后则问题不断。这似乎是很矛盾的：在政策法律缺失、社会不断动荡的文革时期，民族关系被认为很好，而到 80 年代以后，党的各项民族宗教政策得到落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反而民族意识提升，族际间矛盾增多，民族

¹ 靳薇，“新疆维汉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01(4)。

² 吴仕民，《民族问题概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94。

分裂活动开始日益猖獗，民族关系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是维护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工作。

事实上，民族关系不仅是现实的客观反映，某种程度更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与民族意识密切相联。当族际差别意识强烈的时候，对族际之间的关系才会被敏感地意识和强调，族际关系也就成为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决定了其阶级所属，政治分层系统起决定作用，并往往替代了社会中其它群体分类体系，如性别、民族等。在新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淡化使政策失误在当时并未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1978年后，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涉及各个领域，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被平反，过去政党和领袖的神圣光环逐渐消失甚至破灭，个人意识提升，社会群体类分的归属感增强。民族意识、宗教意识明显上升，被认为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进入80年代后，新疆各地都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是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群体骚乱事件，如：1980年阿克苏“4·9”事件、1981年叶城“1·13”事件、1981年伽师“5·27”暴乱、1981年喀什“10·30”事件等，民族关系主要是维汉关系趋于紧张。在“文革”期间公开的宗教活动停止，宗教场所被关闭。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南疆各地宗教场所也迅速增多，70年代末，喀什地区共有清真寺3,450座，2000年前后达到12,300座¹，普遍存在党员信教、学生信教的现象，宗教氛围日益浓厚。

对这种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化、严重化原因的认识，基本可归为两类。一是认为是长期压抑后的反弹，而压抑越深，其反弹力量的强度就会越高，因此这仍被归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被破坏的结果；二是认为这是民族宗教工作管理缺位所致，由于一味强调“文革”期间的政策失误，关注平反和政策落实，也就助长了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提升，尤其是宗教管理工作一度放松甚至放任，致使宗教活动泛滥。有人将80年代初民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归因于1980年旨在落实民族政策、逐渐把汉族干部调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三干会”的负面影响²。至今笔者在南疆调查时，仍然可以听到一些干部在谈及这段民族关系变化时，持有这类观点。这种说法，也是对当时民族政策失误的一种反思。这两类解释，起初以“文革”后的反弹说为主，以后随着新疆社会稳定问题日益严重，政策失误管理缺失说占了上风。

1990年发生的巴仁乡反革命暴乱成为另一个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民族分裂活动升级，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成为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1991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新国家的成立，尤其是与中亚几个与新疆位置相邻、民族同根、文化同源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大大提高了这些民族的自尊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刺激了一些自认为没有民族国家的人士。在世界民族主义潮流之中，国内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上升，尤其是一些精英人士更关注本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对涉及到本族与他族之间的权益分配表现得很敏感，而区域发展差别、收入差别、贫穷落后等经济社会问题支持了要求公平权益的呼声，也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加以利用来争取民众的绝好工具。在新疆，稳定与发展是一对共生共存的矛盾，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条件。但由于在人力、资金等有限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稳定与发展顾此失彼的现象，因而长期以来就存在着政府强调两头和实际偏重一头的现象，稳定形势越紧张，发展的局势就越不乐观；发展差距越大，民生改善步幅越小，支持稳定的社会基础力量也相应被削弱。

在20世纪后20年，民族分裂势力活动持续不断，新疆社会稳定的形势不容乐观，民族关系、宗教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些看似普通老实的人成为危害社会安全、民族团结的危险力量。政府对这种形势的直接应对方式，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更加重视社会防范和民众教育，表现为：一是对少数民族人口聚居的乡村社会控制松弛进行反思，强化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¹ 1999年度自治区社科基金委托项目《新疆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刘仲康主持)课题结项报告，第119页

² 朱培民、陈宏、杨红，《中国共产党与新疆民族问题》，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183-187.

二是提高健康干部队伍的要求。宗教思想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些党员干部以民族身份替代政治立场、混淆是非的缘由，对宗教、民族意识的抑制逐渐受到重视；三是对于普通群众(主要针对几个民族)的思想教育、行为管理趋于严格，社会控制力量明显加强，且时有因族别不同而被差别化对待的现象(如在出国、去内地省市甚至区内流动等方面相对更严格的监督管理措施)。其结果是，民族分裂活动活跃→社会控制加强→民族意识上升→族际关系受到负面影响。政府为反民族分裂而加强对特殊人群的社会控制，却又很难避免出现控制面、打击面扩大化、概念化的倾向，一些民族成员因遭遇特殊对待而认为被歧视，更强化其民族分界意识，激化民族情绪。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是突发的，却并不是偶然的，其波及面之广、参与人之多、手段之极端，尤其是事件中及其后对该事件反应的族别差异，反映了族际关系的敏感与脆弱，说明相互偏见和隔阂的长期积淀。当然，该事件也突出表现了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社会底层群众借此发泄不满，社会管理机制对体制外人员疏漏。因此，虽然说“7·5”事件对新疆民族关系（主要是汉维关系）的负面影响极其巨大，但并非表明“7·5”前的族际关系就是非常乐观的。

二、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

我国的许多学者认为，民族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¹。从宏观层面看，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民族交往是族际关系的主要表现，同时三者也是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因素。结合对新疆民族关系现状的分析，笔者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论述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因素。

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各民族政治法律地位的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这实际直接关联的是自治民族的权益分配问题)，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等方面。我国在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对少数民族政治权益的保护，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解决中央与民族聚居区域的关系问题；通过积极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解决各民族政治权力的分配及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权益的分配问题。但在照顾到群体平等的同时，往往出现与个人平等相冲突的现象，于是在保证群体平等时要以个人相对不平等为代价，如在干部选拔、升学考试录取等方面，对某一群体的支持和照顾相应使群体外的人感到不公。当然，绝对追求个人平等的结果也会因群体在发展基础等方面的差异性导致群体间更大的差异性。因此，以调节族际关系为目的民族优惠政策，应及时调整政策的幅度和对象，在利于群体趋向平等的同时减少个人不平等感受。

另一方面，群体平等的制度设计因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实现，如不同的人口规模、分布形式等会使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权益分配时出现不平等。以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关系为例：新疆是一个大的自治地方，其下又分为州、县两级自治单位以及民族乡，一些民族同时兼有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双重身份，多数民族是非自治民族，自治民族和非自治民族的矛盾焦点在干部使用问题上，如塔塔尔、乌孜别克、俄罗斯等民族具有散居、人口较少等特点，这使他们在干部提拔任用上更易被忽略。人口流动也是引起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自治民族担心本民族人口比例下降会使自治权利受到影响。可见，平等永远只是相对的，群体平等的制度导向也是相对的、可变的。

由于民族因素的重要性，政治权力在各民族间的分配(以官员的数量和职位为代表)倍受关注，但干部职数在不同民族间不论是按比例(人口比例)分配、按位置分配(职位同族承袭)还是按能力分配，都只能满足部分人的期望；以民族身份争取个人利益的现象普遍存在，个体在政治地位上升过程中的遭遇的不公或不畅，易被转化为所在民族的不公。选拔过程中，政治态度与工作能力、

¹ 徐黎丽，《论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问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3。

汉语能力与本民族认可等因素的权重都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政策适宜性的思考，政治因素、政策因素在族际关系、人际关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反华势力的活动，通常都做为政治因素去考虑。1996年，中央明确提出了“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被认为是维护新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最重要的因素。¹近些年，中国境外的敌对势力加紧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破坏活动，企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把中国搞垮。境内的分裂主义分子遥相呼应，不断强化分裂新疆的舆论宣传，攻击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包括民族宗教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政策、干部政策、经济政策，西部大开发等，夸大政府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与不足；违反国家的宗教法规和政策，叫嚣“宗教自由”，煽动宗教狂热；利用各种机会制造民族纠纷，煽动“反汉排汉”，宣扬民族对立、民族仇恨情绪，使一些群众受到蒙蔽，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因而更为复杂。国际反华势力则以保护人权为名，行分裂中国之实的活动，对中国政府造成现实的压力，在对国际舆论难以掌控的状况下，对国内的舆论就会有更严格的控制措施，避免来自国外不良影响。持续的高压政策，会造成社会压力增大，民众的忍耐性减弱，敏感性增强。压力下的安定是不会长久的，而且国内的社会控制手段很易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开放的社会环境，可能发展为有序有活力的社会，也可能变为动乱缺少权威的社会。

影响民族关系的经济因素，主要表现为生产结构、收入分配上的区域差别和个体差别某种程度与民族地区、民族身份关联而被认为是民族差别，出现经济利益分配不公或国家发展政策倾向性的指责。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方面区域差别与民族人口分布重叠使少数民族地区往往成为落后和贫困的代名词。目前，西部和东部、新疆和内地省区、新疆南部和北部在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很大，甚至还在不断扩大²，这种发展的区域性差别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某种程度成为民族问题，长期持续就会对民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并成为分裂势力惑众的一个重要理由；其次，受就业结构族际差别的影响在个人收入水平上总体表现出族际差距。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就业的行业门类、单位的体制、部门、岗位等对就业者收入的多少往往有着很大的影响作用。受到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中从事传统农牧业生产和小商贩的比重较大³，即使是进入就业市场后，也往往因为汉语能力有限，技术水平较低，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影响其个人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当然，少数民族家庭收入水平相对低也与其家庭人口多，抚养负担较重有关。再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存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博弈，新疆资源输出型经济的特点，决定其对矿产资源开采补偿和本地留用比例(主要是油气资源)、生态环境修复等方面更为关注。做为民族自治地区，区域利益往往在民间甚至官方被认为是民族利益，对分配不公的质疑就可能引发民族关系问题。

影响民族关系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传统道德观念的维系方面。目前多数地方采用的双语教学模式⁴对部分民族母语的冲击较大，双语教学成为影响族际关系的重要的

¹ “没有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坚决斗争，就没有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没有新疆的稳定与发展。”，参见王乐泉在自治区第五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六日)，《新疆日报》2008年09月17日。

² 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5年距全国31个省(市、区)的第15位下降到2008年的第30位，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水平从2005年的第5位下降至23位。新疆的贫困人口多为少数民族居民，贫困县、乡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人口集中的边远地区。2009年，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94%)人均GDP仅为全疆平均水平的31%，低收入贫困人口占到全疆低收入贫困人口的84%以上。

³ 据2000年五普数据，新疆少数民族15岁及15岁以上在业人口中，农林牧渔水利从业人员占75.1%，汉族同比为36.8%。

⁴ 新疆的“双语教学”实际是指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接受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两种语言的学习。目前有授课和(1)以少数民族语文为主，加授汉语课程；(2)授课以汉语文为主，加授少数民族语课程；(3)部分课程用少数民族语文、部分课程用汉语文几种模式。其中(1)是传统模式，(2)是目前大力提倡的模式。

问题。对双语教学的困惑主要集中于几点：一是双语教学实际成为汉语教学(母语只是加授的一门课程)，对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使用时带来巨大冲击；二是在双语教学的过渡期内，由于没有切实照顾到师资水平、语言环境、学生能力等区域以及个体的差异性，使相当一部分学校和学生面临学校教育水平下降，汉语言能力提高的同时其它文化课水平下降。由于这个过渡期可能是较长的，因此有对少数民族一代人前途的担忧；三是双语教学使相当数量的长期担任民语教学任务的少数民族教师因难以胜任而换岗、退休等，社会地位由此而下降。因此，在双语教学因顺畅少数民族普通群众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而广受欢迎的同时，在更关注本民族语言文字前景的知识精英中的负面反应较多。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双语教学推进速度太快，师资力量难以保证，教学质量低，也使不少愿意接受双语教学的群众对双语教学产生疑虑和担忧。

民族传统文化的问题最主要表现为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失落，如集体主义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上升；老人、宗教人士的传统权威弱化，代以对权力和金钱、财富的膜拜；只重现世不重来世，(对自然或神)敬畏感减弱或消失；道德感化代之以法律强力约束，等等。这是现代社会的通病，更是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所担忧的。酗酒、吸贩毒、艾滋病等，这些因个人行为失范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到个人生命甚至可能危及民族生存。这种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促使一些民族精英寻找强化民族传统文化良方，而宗教的道德戒律作用更容易发挥作用。

目前，一些宗教行为(礼拜、封斋、朝觐等)更为盛行，儿童学经现象禁而不止，一定程度上是家长对子女行为更多遵循传统道德的希望，但却违背了我国的法律。目前，国家对于道德的约束力量是很注重的，但由于民间对道德的重建被寄希望于回归宗教，而虔信宗教又有离心力增强之危险，加之分裂势力的蛊惑活动，就产生一种悖论：当一些少数民族群众把提倡道德行为替换为倡导宗教思想时，一些政府官员则为了弱化宗教的影响，反而支持其相反的行为，如在清真餐馆普遍禁止喝酒抽烟之事，一些少数民族人士认为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反映，政府则认为是极端宗教思想的表现，两者相抵，政府就可能被认为有败坏社会风气的导向。当政府被认为是汉族人的政府，对政府的指向就会成为对汉族人的指向。在以本族社会道德重建为号召时，汉族人被作为道德污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携带者、传播者，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攻击者往往打着极端宗教的旗帜。

从世界范围看，原教旨主义是对信教者生活和思想的一种强约束，为什么却在不断泛滥，被许多人所接受，不仅是宗教极端分子的鼓吹，还有其现实存在的基础。许多民众是从净化社会风气、重塑社会道德的角度去认识极端宗教思想的，在中国也同样¹。少数基层政府官员对信教者带有极端宗教色彩的行为(如年轻男性蓄大胡子、女性黑纱蒙面着宗教服饰等。部分人是以此表现信仰，部分人是因为社会风尚或社会压力)采用粗暴简单的打击方式，都可能加深政府和民众或汉人和信教者的矛盾。受到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宗教对信教者的社会日常生活的干预程度加深。而政府绝不能允许宗教干预教育、婚姻和司法行政，并期望以国家主导文化的规则安排社会生活。宗教管理部门与部分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有了相互的博弈进退，宗教问题成为政府棘手的难题。由于少数民族的社会弱势和心理弱势，宗教情绪往往容易被放大，宗教问题时常成为扰动民族关系的触钮。

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一体化在逐渐形成，统一的竞争环境及对效率的追求，使一些民族某些传统产业趋于消失，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某些优惠政策不再适用。文化的普同性增加，使某些民族传统文化逐渐衰退甚至消失。而文化的普同性，往往由先行进入现代化过程的汉族人传播或被认为是汉族文化的一部分。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这种一体化过程不能理解，不愿接受，甚至认为

¹ “人们对失控的理性主义与放纵的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道德滑坡有一种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就带有宗教与族裔的色彩”。[英] 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92.

是“汉化”的作用，对民族关系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综合来看，所谓影响民族关系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实际是社会事实整体，相互影响，不能割裂。如收入问题被认为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在宏观上与产业结构、税收政策(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有关，在微观上与个人就业状况有关，而个人对就业市场的进入，除市场需求外，还取决于其受教育情况、对相关职业的适应力、消费和积累观念等文化因素。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民族关系各要素中的首要要素，“尽快解决西部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贫困问题，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首要任务”¹。联系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分析，笔者以为政治因素是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首要因素。正如俞可平指出，在政治发展的现阶段，社会治理的好坏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²。对一个具有强大控制力的权威型政府来说，通过各类政策调控内部民族关系的功能也应很强大。这种政治因素，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的导向和实施，因为政策是我国政府调节民族关系最重要的手段；另一方面是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能力。分裂势力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通过经济或文化手段可以解决的。相对于经济或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更直接、更敏感，短期内更具有影响力。经济或文化因素，与政治、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其解决的程度如何，是政府能否获得民众长久支持的最重要的因素，新疆的长治久安即取决于此。

三、新疆民族关系的走向及其调控

对于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有许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影响我国现阶段民族关系的主要有五对正负作用因素：民族平等的进一步完善与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继续明显存在并存；民族团结的大趋势与民族主义包括民族分裂主义思想滋长并存；民族间互助合作的发展与民族间经济领域竞争增强并存；民族共同发展的趋势与民族间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并存；民族联系交往增多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增强并存。深入研究这五对关系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正遏负”。³实际这里反映的是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发展、民族意识等五个方面存在的两种发展趋势，这五个方面是构成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暴发，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同类事件中，造成的人员伤亡最多、财产损失最大、影响最恶劣的事件。新疆的民族关系中的问题以及“7·5”对民族关系可能产生的长远的负面影响受到各级政府及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中央进一步加强对新疆经济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力度，2010年3月底，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确定北京等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拉开为期10年的新一轮援疆工作序幕，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员开始进入新疆各地州、县市。5月中旬，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提出“……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进步的基本前提”。自治区党委迅速行动，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全疆各族人民的力量凝聚到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实践中。从目前中央对新疆的要求以及自治区工作状况来看，随着政策的调整，影响新疆民族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也发生了变化。

政策的变化可通过一年多来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的重要举措表现出来：以对少数民族爱国诗人、文化名人的尊重表现对少数民族文化及爱国知识精英的尊重；高调推崇在内地打工的维吾尔族慈善家阿里木的形象并演绎一段兄弟情；大张旗鼓地接回在内地的新疆籍流浪儿童，改善新疆人在内地的形象；送待业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到对口援疆省市学习培训并承诺安排就业；全

¹ 张立辉、赵野春，“和谐民族关系研究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12).

² 李扬、俞可平，“社会良序更多依靠社会自治与自律”，《文汇报》2011(04-18).

³ 金炳镐，“和谐民族关系与和谐社会构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7(9).

力推进富民安居工程与定居兴牧工程，改善农牧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等等。这些举措明显表现出几点指向：通过加强内地省市与新疆政府及民间政治、经济、文化、人员的往来，增加彼此的了解，培育相互的依赖；强调以改善民生凝聚民心，增强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感恩之情和向心力；重视宣传少数民族文化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正面形象，并通过尊敬和信任拉近彼此情感。这些都体现出政府方面对族际关系积极调整的态度。

同时，自治区党委改变过去强调打击民族分裂势力政治性、特殊性的做法，提出“反暴力、讲法治、讲秩序”的原则，推动维护稳定的工作逐步走上常态化轨道。对于法治、秩序的强调，事实上就促使在对民族分裂、暴力恐怖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中，减少其政策性、随意性，淡化特定的族别背景，也使因新疆维稳的特殊政治性而使打击面、防范面扩大化的可能性减少。

政策调整对新疆族际关系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宽松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拉近了新疆与内地的距离，密切了新疆人与内地人的交往，缓解了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对本族社会中存在相对严重的就业、贫困等问题的怨言，等等。但同样明显的是，任何政策的效果都不会是绝对正面和积极的，其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或弱化其负面的影响。其负面影响如：跨越式发展会对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传统价值观念带来更强烈的文化冲击以及沉重的心理压力，诸如游牧民定居、失地农民进城、土地集中、农民打工等，许多农牧民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出现适应困难或畏惧心理，他们可能面临着几种选择：或者调整心态改变习性去适应变化，或者躲避变化和压力维持现状而沦为社会边缘人、贫穷者，或者以行动表示抗拒而成为社会的对抗者。理性选择无疑会使第一类选择占绝大多数，但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愿望，除个人因素外，社会结构性问题也会使一些人在第一种选择失败后不得已进入第二甚至第三种状况，后者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不发展或发展慢有危机，发展太快也会出现诸多问题，如何能在跨越式的发展速度中获得长治久安？某种程度这是由发展的目的决定的，如果发展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幸福和认同，就需要更多地关注他们的感受和需求。

调整高压政策在使社会宽松、戒备心理消解、信任度增强的同时，也可能使分裂势力有发展的机会。正如学者指出的，如果国家对社会抗争采取包容的态度，短期言，会降低社会抗争的成本，使社会抗议者走向街头，激发社会动员；但从长期看，包容释放和缓解了社会不满，一些社会抗议者更有可能转向更为常规的政治活动，缓和自身的立场和策略，有效地使得异见者被制度化，从而从根本上有助于政治的稳定¹。

在当前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新疆民族关系的走向也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几种可能：

走向一：平稳和谐型。表现为族际交往进一步密切，并逐渐由工作领域向社会领域、个人生活领域渗透；发展共享、利益互惠日益成为共识和现实，文化的独特和多样更多是个人及群体选择的结果并能够得到基本满足；族际间的心理距离缩小，族别差异的敏感性下降，民族关系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

走向二：分异敏感型。民族意识进一步上升，以民族为利益群体的导向明显，民族身份成为争取个人及群体政治、经济权益的工具和衡量社会公平的标准，族际之间表现为相互容忍、有限交往、有意隔离。民族问题更趋敏感，族际矛盾增多，但在政府强力控制下社会大局保持总体平稳。

走向三：断裂冲突型。族际矛盾突出，不同民族的人心理隔阂加深，分裂势力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社会趋向以民族群体为边界的断裂形态，在居住、交往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民族内聚性。交往面越大冲突的可能越大，族群内聚的趋向就越明显，社会稳定形势紧张，民众缺乏安全感。

¹ 黄冬娅，“国家如何塑造抗争政治——关于社会抗争中国家角色的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2011(2)。

目前不论从官方表述还是学者们的研究，基本都是对第一种走向的肯定，认为这是中国也是新疆民族关系的基本发展方向，而对第二种、第三种走向提出警戒。笔者也认可这种观点，它表现了人们对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信心。正如前文所说，对新疆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最大，国家政策的影响力最大，政府对于调整族际关系的积极态度和有效推动可以预示族际关系的基本走向。但同时，第二、第三种走向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政府一些有意促进民族关系和睦的做法如果失当反而会伤害族际关系，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譬如过快推动双语教学引发了一些人对民族文化危机的忧虑；快速发展带来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改变使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出现适应困难；再如政府主导解决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与就业市场选择劳动力的现实有矛盾，政府解决的途径主要是进入岗位有限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各类低收入的公益岗，而在大力倡导的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各类企业招收培养少数民族职工的数量仍很有限，其就业结构有可能进一步固化，影响其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转型的步伐，从而加剧对民族社会分层的担忧。因此即使是好的政策也要在实际操作中更稳妥，不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尤其不要以为政府愿望良好、措施得力，就试图迅速改变民众长久形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习惯，避免因少数官员好心办坏事而引起一些民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另一方面，由社会结构决定的民众需求和精英希望往往是不同的，政府在处理族际关系问题时可能面对差异甚至是矛盾的需要，如何对待差异、回应呼声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一般而言，族裔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代表‘民族’的利益，指导民族的文化政策，证实民族的遗产、文化和象征。”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推动主要来自民族精英，入世的知识阶层的“需要、成见以及抱负一般左右着一代代族裔民族主义的目标及策略”¹。对民族知识精英的忽视可能导致民族意识上升，激发起民族主义动员。因此，对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的教育和使用一直是政府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他们的呼声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对他们有关保护民族文化、争取权益方面的意见。要为各族精英通畅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对政治上过得硬，工作能力强的少数民族干部充分信任，委以重任。

即使是新疆的发展取得更大成就，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也不会销声匿迹，政府的严密防范、严厉打击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小规模的组织或零散个体的反政府行为和以恐吓民众、扰乱社会为目的的有特定对象(如针对汉族人、官员等)的恐怖行为。而此类事件若频繁发生，将使人们缺乏安全感，并对特定人群产生戒备心理，减少族际交往和相互信任感，受害人及其亲友甚至更大范围群众产生仇视报复心理，也会对族际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因此，一是要转变社会安全观念，充分认识我们与分裂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零散的小规模的事件将是一种常态，不会因为发展而减少或消失，要使社会防控常态化，也要普遍提高公众面对突发事件的防范心理和自我保护能力。二是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这是孤立分裂势力，争取民心民意的关键，也是维护稳定的必需。

¹ [英] 安东尼·D.史密斯著，龚维斌、良警宇译《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83页、118页。

【论 文】

抗战时期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与文化认同

——诗人黎·穆塔里甫的思想与创作研究

姑丽娜尔·吾甫力¹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抗战文学是一个重要内容。新疆各民族的抗战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非汉语书写问题，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的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及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是一个久未研究的空白。本文将以维吾尔族诗人黎·穆塔里甫的创作为重点来说明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背景下，抗战时期新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自觉将本民族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将维吾尔文学创作自觉纳入中华民族抗战文学的整体格局中，以其宽广的胸怀与视野，强烈的中华民族忧患意识，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近一个世纪以来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这对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及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理论都十分生动而有力的诠释，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抗日战争 新疆维吾尔文学 中华民族国家意识

假使成群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任务，
在艰难的环境中能埋头吃苦，
心理盘算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¹ 作者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师范学院教授。

假使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掌握建设技术，不向困难低头，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怕牺牲自己，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黎·穆塔里甫

这是一位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维吾尔族青年诗人黎·穆塔里甫（Lutpulla Muttelip, 1922-1945）创作于1938年的一首名为《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诗中的两段，当时诗人年仅16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他挺身而出，向各民族知识分子发出敢于担当、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宣言。在短暂的一生中，他创作了《致人民》（1937）、《中国》（1938年）、《我们是新疆的儿女》（1938）、《战斗的姑娘》（1941）、《给岁月的答复》（1943）、《爱与恨》（1943）、《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著名诗篇、剧作和散文，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由于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的诗歌剧作对国民党反动政府造成猛烈抨击并在群众中具有极大号召力，他在194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3岁。1952年8月，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给黎·穆塔里甫家属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对黎·穆塔里甫给予高度评价：“黎·穆塔里甫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¹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新疆抗战文学

1930年，中国共产党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开展工作。1937年抗战爆发前后，陈云、滕代远、周小舟、邓发等同志都曾先后到新疆工作。1938年春，党中央派来了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1939年又派来了中央委员陈潭秋等同志。这些共产党员不仅在新疆省政府一些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在和田、喀什、阿克苏、库车、哈密等地担任行政、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领导职务。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推动与大力支持下，新疆各方面事业有了蓬勃发展。1935年，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成立，1938年，反帝联合会改组后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长并主持工作，“反帝会”出版了《反帝战线》、《新疆青年》等刊物，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和支援前线活动。矛盾、张仲实等内地来疆的进步人士领导的新疆文化协会，组织新疆学院的汉族和维族学生演出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为纪念“九·一八”演出了话剧《战斗》。之后新疆文化协会又成立了实验剧团，演出了多部话剧和独幕剧，如《放下你的鞭子》、《信号》、《无名英雄》等，培养了维吾尔族、汉族等各民族的演员。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后，这些进步人士都被请到新疆学院去讲课，提高了该校的声誉和质量。同年8月，著名演员赵丹和一批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抵达迪化（乌鲁木齐），进一步促进了新疆各项文化艺术活动的开展，²这些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文化人士通过各种组织文艺活动，将内地的进步文学艺术思想带到处于西北边陲的新疆。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下，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相继成立，并在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了大量抗日爱国活动。“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简称“维文会”）于1934年成立，这是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中成立较早的一个群众文化团体。“维文会”在发展和繁荣维吾尔文学及宣传号召民众参与抗战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这一时期，在这些爱国进步人士的影响下，许多维吾尔青年诗人和作家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激励各族人民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暴

¹ 赛福鼎·艾则孜著，《赛福鼎回忆录》（维吾尔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294页。

² 白振声、（日）鲤渊信一等编著，《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北京：中国1992年版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278页。

政。维吾尔作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许多以抗日为题材的维语现代戏剧作品，向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号召各族民众积极捐献支援抗战。仅 1938 年一年里，全疆募集抗日捐款新疆币近 30 万两，这些捐款捐物先后由新疆反帝会用来购买 10 架飞机、20 万件皮大衣以及汽车、机枪、药品等物资，10 架飞机被命名为“新疆号”，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同舟共济、共赴国难的坚强决心¹。

当时，喀什的维文会艺术团排演了一批维吾尔语话剧和歌剧，如《卢沟桥事变》、《战斗的浪潮》、《东京的命运》、《战斗的姑娘》等剧目，由于话剧和歌剧在南疆地区是全新的文化形式，这些大胆的尝试给喀什各族民众以强烈的新鲜感。如维吾尔族剧作家阿不都秀库尔·亚力昆用维吾尔语创作，以内地汉族人物为角色的《上海之夜》，由穆依丁·霍加根据中共人士林基路讲述的故事改编的歌剧《游击队姑娘》，以及《九·一八事变》和《战斗的岁月》等剧目的上演，使喀什各族群众第一次形象地了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和中国人民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叶城县剧团演出的《抗日联军》、《团结就是力量》，在各族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²。著名剧作家祖依·喀迪尔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愚昧之苦》、《游击队员》、《遭遇》等剧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行。《游击队员》塑造了一位游击队长的高大形象，该剧在伊犁上演时，剧场里不时爆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而黎·穆塔里甫在此期间创作的以描述内地汉族农村姑娘玉兰由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成长为抗日游击战士战斗历程的歌剧《战斗的姑娘》，成为当时抗日戏剧中观众喜爱的剧作之一。

诗人尼米希依提在 1942 年创作了《伟大的祖国》，可视为他在现代时期爱国主义诗篇的代表作。他将祖国喻为母亲，以自豪的笔调抒写了“母亲”的富饶、气概和魄力。作为“中华儿女”的一员，在日本侵略者践踏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尼米希依提表达了对祖国由衷的热爱和赞美之情，不愧为祖国母亲的忠实儿女。但当他想到豺狼逞凶、祖国受难的情景时，诗人笔锋一转，揭示了日寇的罪恶与祖国的蒙难，并通过拟人化的祖国之口发出“向敌人反攻”的正义呼声。

伟大的祖国，我的母亲，
山、林、花、海全在你胸中。
金黄的土地、富庶的高原，
你雄伟的身姿毗连着天边。
黄河、长江飞流一泻万里，
你英雄的气概、民族的性格；
昆仑、天山巍峨横跨千里，
你强健的双足，忠耿的卫士。
你有叱咤风云震动群峰的尊严，
你有调转江河倒流的魄力，
你有融化冰雪、驱沙为田的热量，
你有驾时代巨轮前进的中华儿女。
那在深山茂林嬉戏的梅花鹿，
那在园中花间欢唱的百灵，
那在海洋湖间游动的鱼群，
都是你娴静温爱的象征。

¹ 马树康著，《百年喀什》，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2 年版，100 页。

² 马树康著，《百年喀什》，168 页。

侵略者像豺狼向你伸出血舌，
企图用枪声震荡你智慧的神经，
他们用枷锁扣锁你的手足，
日寇在卢沟桥向你出兵。
乌云一时罩在你的头顶，
血的河流、罪恶的火焰腾空。
你挺身向人民挥手，
向敌人反攻！反攻！

在诗作的最后一节，作者发出由衷的呼声：

伟大的祖国、我亲爱的母亲，
你的一切都在人民的手中。
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人民，
祖国！你像睡狮梦醒！¹

维吾尔族诗人乌提库尔（1923—1995）的创作始于1939年。他自己曾这样写道：“30年代末，在革命先烈林基路、杜重远等人的直接教育和先进的苏联文学的影响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²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诗人创作了不少抗日爱国题材的作品，陆续刊登在《新疆日报》和新疆学院校刊《新芒》上，这一时期诗人的代表作是抒情长诗《渴望新中国》。诗人在诗中用火热的激情描绘了祖国几千年灿烂的历史、美丽富饶的河山、勤劳勇敢的人民和他们优良的道德情操，谴责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到抗战时期妄图霸占我国的外国殖民者和国内统治阶级的罪行，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不怕牺牲、积极进取的精神，呼吁全国人民继续团结战斗、争取抗战的胜利，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可能站到你管理的坚定信心。赛福鼎·艾则孜的创作始于1938年，他的处女作《孤儿托乎提》在1938年发表后，奠定了他创作中的为人民的基调，之后，其创作或者反映心爱层劳苦人民的悲惨遭遇，鞭挞统治者的恶性，或是塑造抗日英雄形象，号召各族人民团结抗战，建设美好家园，其抗战题材的创作主要为戏剧，代表作有《光辉的胜利》（1939）、《九·一八》、《给不速之客的礼物》等等。

在新疆少数民族抗战文学的雄壮队伍中，维吾尔族诗人黎·穆特里甫创作的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诗篇，不仅作品数量多、流传时间持久，而且在诗人短暂一生中所创作文学作品的主题，始终围绕着歌颂伟大祖国、憧憬新中国，号召人民奋起抗战、保家卫国，追求知识与光明，揭露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恶习等展开，在新疆的抗战文艺作品中具有重要的代表意义。

二、杰出的维吾尔族诗人黎·穆特里甫的思想和文学创作

黎·穆塔里甫是维吾尔族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思想先驱，也是20世纪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在自己短短23年的生命历程中，以饱含对伟大祖国的憧憬和火热的激情，讴歌祖国，讴歌新时代，代表了当时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中国》、《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我们是新疆的儿女》、《战斗的中国妇女》、《创造解放的花园》等诗篇和《战斗的姑娘》等剧作，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新疆各族儿女团结一心，与祖国人民一

¹ 阿扎提·苏里坦等著：《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1页。

² 阿扎提·苏里坦等著：《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0页。

道共同抗战，建设美好的新中国。特别是他的经典作品《给岁月的答复》，在维吾尔族中家喻户晓，至今许多人都能朗诵，这是一篇讨伐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檄文，也是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经典诠释，发表后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和回应，影响了一代维吾尔族青年。诗人以其高尚的品德和诗歌创作才华、对国家对人民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当代维吾尔人民的精神榜样，被人民所缅怀。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最后将他残酷杀害。

黎·穆塔里甫 1922 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区尼勒克县。1932 年，黎·穆塔里甫来到伊宁市，就读于塔塔尔初级小学，之后考入伊宁市俄罗斯中学，学会了俄语，阅读大量俄罗斯古典作家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著作，他通过俄文广泛地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同时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对他的创作产生较大的影响。不久，他在安瓦尔·纳斯尔、努尔·波萨科夫等维吾尔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较早就迈入了诗歌的创作园地，1937 年起就开始在《伊犁日报》上发表维吾尔诗作。这一年他创作的《致人民》一诗，具有特别的意义：

嘿！新疆人民，
时时准备着肩负重大使命！
准备着啊！加强我们的战斗力量，
去战胜最疯狂的敌人。
中国的上空盘旋着灾难的鸦群，
最后决战的时刻已经来临，
战场上传来胜利的消息，
我们要为英雄们作好后勤。
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帝国主义挖掘葬身的坟墓。
让我们日日夜夜奋战吧！
严冬即将过去，
人类幸福的春天就要来临。
深刻记着和世界人民的友谊，
在战斗中必须坚强、勇敢，
在解放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作一名祖国大家庭的优秀儿子。
迈开大步走向幸福的明天，
为祖国，为人民勇敢地向前。
为被压迫者打通幸福的道路，
使他们也同享人类的春天。
啊，亲爱的人民，
作一颗战斗的星吧，
用生命来迎接太阳。¹

在这首诗中，最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作为一位维吾尔族诗人，诗人没有在诗中呼唤维吾尔人民，而是呼唤全新疆人民，这使他的思想境界超出了同时代很多维族诗人。同时，他号召新疆人民做祖国大家庭的优秀儿女，并且要深刻地记着和世界人民的友谊，要为被压迫者打通幸福的道

¹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 页。

路，使他们也能共享人类的春天。这是多么高远的思想境界和宽广的胸怀！已然超出了一己之民族的界限，追求的是中华民族的解放，并进而拥抱全人类的春天。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对黎·穆塔里甫思想的提高和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时黎·穆塔里甫的创作正值黄金时期，他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作，如《致人民》、《我们是新疆儿女》、《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1938）《直到红色花朵铺满宇宙》等。他的《中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青年诗人满怀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眷恋、对新中国的无比憧憬，写下了这首长诗《中国》（1938）。这首诗在诗人的创作中、乃至在中国抗战题材创作中，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仅是年轻诗人在国难当头抒发的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新中国的无比坚定的信心，影响了一大批各民族知识分子和群众，起到了很好的凝聚人心的作用：

中国！
中国！
你就是我的故乡！
因为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民，
生长在你温暖
纯洁的怀抱里。
从你那里，我们得到了庇护，
认识了自己，
明白了事理。
……
写吧！
写那战斗的起点——
 东北，卢沟桥；
写吧！
写那英勇的爱国志士——
 年轻强悍的战斗员；
写吧！
写那些猛虎——
 意志坚强的游击队，
写吧！
写那屹立在后方的——
 美丽富饶的新疆！

中国！
你瞧，
我们就是这样驰骋在你的土地上。
每一分钟都在保卫者你，
争取你的未来！
在世界上
要建立起
唯一的、崭新的、独立的新中国！
在你的土地上，

我们要树立起，
永久飘扬的
始终不倒的
解放的旗帜！¹

诗人在创作这首诗时，年仅16岁。一位16岁的青年，满怀对祖国一腔炽热的爱，在距离新中国成立的十年前，对于祖国的未来、对“唯一的、崭新的、独立的新中国”能够具有如此的境界和胸怀，怎能不令人佩服、尊敬、骄傲！这位年轻的诗人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解放、人类的进步紧紧相连，高昂起头颅，高唱着战歌，如果没有对祖国的高度认同、如果没有将个人的、本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相连，诗人是不会有如此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同样，如果没有对中华民族未来的信心和自豪感，也不会那样饱含深情去憧憬美好的新中国的建立。应当说，这不仅是黎·穆塔里甫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而是由他代表的当时一大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共同的境界和追求，也是抗战时期广大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性体现。

诗人在1938年创作的另一首诗歌《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也是一首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诗歌，这也以往的维吾尔文学史抑或是关于黎·穆塔里甫的诗歌研究中并没有太多提及的一首：

.....

假使在每个地方都能听到工厂的汽笛，
火车在铁路上奔驰呜呜长鸣。
假使飞机在空中隆隆飞行，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英雄的青年们能挺胸而出，
对每一件事都能英勇机警，
假使从阴暗的角落里能放出光明，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成群的知识分子能担当起任务，
在艰难的环境中能埋头吃苦，
心理盘算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

假使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掌握建设技术，不向困难低头，
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怕牺牲自己，
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²

他在《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1939）一诗中写道：

.....

为斗争举起的每条巨臂，每句语言都充满着胜利，
在这战斗的路上，一个倒下，成万的人站起，

¹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4页。

²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8页。

为了建设新中国，我们用钢骨打下了根基，
为了使它更牢固，我们把骨头当作磐石、把血当成水泥，
我们还要奋斗，直到红色的花朵铺满了宇宙！¹

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表达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高度的政治自觉，他们对祖国未来的坚强决心。这是当时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渴望和追求。

1939年，黎·穆塔里甫考入迪化（现乌鲁木齐）省立师范学校。此时，他在维吾尔读者当中已经是一位有影响的17岁的少年诗人。从他创作于1939年的《再见吧，伊犁》这首诗中，我们也可看出诗人对革命、对新思想的渴求由来已久：

那里有我无数敬佩的导师，
我要锻炼，使我的思想汲取新的营养。
她将以新的战斗的血液，注满我的心房。
有一天我的手坚强得能够把红旗高高举起，
东方就会出现旭日的阳光。²

1941年从省师范学校毕业以后，黎·穆塔里甫先后在《新疆日报》、《阿克苏报》担任编辑工作。这时，新疆日报社也是中共党人开展工作的一个重要阵地。“王小川等10多名中共党人分别负责采稿、编审、出版等部门的工作，使《新疆日报》在宣传抗日救国和革命思想、介绍和转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报社印刷厂还印刷了一批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为推动新疆社会政治的进步做了大量工作。”³中国共产党人给《新疆日报》带来的这些变化，也影响着黎·穆塔里甫的思想和创作。

他到乌鲁木齐之后的创作如泉涌一般一发而不可收。他的诗歌《当突破黑夜，留下足迹的时候》（1941）、《来吧，新的一年》（1941），他的诗剧《战斗的姑娘》、散文《她的前程美好远大》等作品都创作在此时。他在《创造解放的花园》（1941）中写道：

现在，饱受痛苦磨难的劳动者，
诅咒战争，举起钢铁的拳头，
摧毁旧世界的压迫堡垒，
建立真正自由理想的新世界。

这个巨大的浪潮激荡着中国，
战斗的号角响彻每个偏僻的角落，
我们年轻的心将像鲜花似的怒放，
我们要把全世界创造成红色的花园。⁴

这首诗，表现了一个革命青年对祖国的、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憧憬！他的视野完全超越了维吾尔民族，而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甚至人类苦难的关注！这是年轻诗人的诗歌创作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性意义的重要体现。通过黎·穆塔里甫的创作，反观今天，当我们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时，

¹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页。

²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5页。

³ 厉声主编，《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60页。

⁴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8页。

只有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思考中华民族的命运和未来的视野和胸怀，才能有高远的理想并能将之付诸行动。在这一点上，诗人的诗歌创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带有了较强的思辨意义，值得我们深思。

1941年诗人创作的又一首重要作品是长诗《爱与恨》，诗歌的主人公是抗战前线的一名姓张的汉族青年。这位青年战士参加抗战上了前线，但不久就因想念父母和恋人，擅离战场，回到村里，受到父母和恋人的指责，他羞愧难当，返回战场，用英勇的战斗来重新赢得亲人的爱，最后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诗人通过这长诗告诉我们，为祖国而战才是最伟大最光荣的，对祖国的爱应该高于一切。

黎·穆塔里甫同年创作的诗剧《战斗的姑娘》，依然取材于抗战前线，塑造了一位汉族女青年的形象，描写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诗剧《战斗的姑娘》为三幕剧，1941年4月在乌鲁木齐创作完成。该剧同样反映了抗战时期一个平凡的农村姑娘玉兰的形象，描述了在抗战的艰苦残酷的过程中一位农村青年妇女如何成长为坚强的抗日战士的故事，该剧的主题是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对敌，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建立美好的新中国。主人公玉兰姑娘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女子，但又是一位胸怀大志、一个有责任心的、爱国的中国公民。这个形象最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位平凡的女性，她顾大局、识大体，将自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祖国深深地爱都融进平凡的生活中。这个剧本曾以油印本形式在全疆广为传播，甚至在一些偏远的县城也上演过，在当时起到很好的抗战宣传作用。

1942年，苏联卫国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军阀盛世才误认为苏联将会失败，便撕去亲苏和进步的伪装，投靠国民党反动派，驱除苏联人员，公开反共反人民，大肆迫害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1943年，国民党在新疆设立省党部，四处安插特务、大规模进行逮捕和屠杀，白色恐怖一时笼罩着新疆。这时，诗人更加坚定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信心和决心，创作了大量诗歌，表达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迎来中华民族解放的理想信念。由于茅盾先生等在新疆宣传和介绍鲁迅的作品，所以黎·穆塔里甫很早就了解了鲁迅，他在1942年9月30日的《新疆日报》上撰文说：“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高尔基的保尔·弗拉索夫、鲁迅的阿Q、矛盾的吴荪甫是文学作品中创造人物形象的典范之作”¹，由此可知当时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鲁迅作品和其它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了解程度。不仅如此，黎·穆塔里甫还亲自为鲁迅塑雕像，由衷地称赞鲁迅是“了不起的文学家、是我们的高尔基”。1942年诗人创作的一篇散文《在死亡的恐怖中》，体现了作者的广阔视野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胜信念。散文描写墨索里尼没有知人善用，把国家大事交给无知的将军们，但这些将军们却在为自己的出路算计，导致连连失败，处于绝望中的墨索里尼向希特勒求助。希特勒为了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想的却是如何侵吞自己的这个同盟国。作者借此揭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和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痛恨，起到了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

这一年黎·穆塔里甫创作了《五月，战斗之月》（1942）、《“皇军”的苦闷》（散文，1942）等诗歌和散文，其中《给岁月的答复》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被维吾尔民众广为传唱的一首诗。诗人对当时国民党制造的黑暗岁月做出了鲜明的回应，表现了奋斗到底、视死如归的决心：

时间太匆忙，一点也不肯停留，
岁月便是时间最快的脚步。
湍急的流水，破晓的黎明依然清晰，
疾驰的岁月却是窃取生命的小偷。
窃取后，头也不回地，
一个追着一个，匆忙逃走。

¹ 新疆喀什地方杂志《喀什噶尔》（汉文）（2007年3期），26页。

在青春的花园里听不到黄莺拍翅，
树叶枯萎凋零，树枝变成秃头。

.....

战斗的人们追随着战斗岁月，
一定会留下他战斗的子孙；
昨晚为幸福而牺牲的烈士的墓上，
明天一定会布满悼念他的花丛。
尽管岁月给我带来了胡须，
但我会 在岁月的怀抱里锻炼自己。
在我面前败走的每个岁月里，
早已铭刻了我的创作——不朽的诗篇。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不会衰老，
我的诗，像天空的繁星在我面前闪耀。
我时时不能忘记，坚韧、果敢就是胜利，
在战斗重重的陡坡上，死亡对我是何等渺小。
我要跟射手们牵起手来，
在前进的道路上紧紧跟随旗手。

.....

岁月，你别得意地捶胸狂笑，
在你面前我宁肯断头，决不受你凌辱。
你别为催我衰老而枉费心机，
我会把我的儿子许给最后的战斗。
岁月之海，尽管你的浪涛那样汹涌起伏，
我们的舰队一定会突破你的浪头。
尽管你以飞快的速度想恫吓我们，
但是创造必定会使你衰老——
这就是我们对你的答复！¹

这首诗至今都被广大维吾尔族群众所喜爱，很多人都以能朗诵这首诗为荣。诗中充满了豪迈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是诗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情揭露和批判，也是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美好家园的战斗诗篇！黎·穆塔里甫的生前好友、维吾尔族著名诗人艾黎坎木·艾合坦木感慨地写道，读着这首诗，我们不能不深感诗人不愧是一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充满必胜信念的革命战士。²

1943 年秋，国民党反动当局把诗人从革命活动日益高涨的北疆地区调往阿克苏专区，诗人还没有走进阿克苏城，关于他的两个案卷早已先到，一个是“情报案”、另一个是“追缉案”。诗人被安排在阿克苏报社不久，就受到阿克苏警察局的传讯。当局让他写悔过书时，他毅然说：“中国人民打日本鬼子也有罪吗？我不会写的！”敌人气得立刻把他关了起来、一周后，再次传讯他要求他写悔过书。他在白纸上画上了一个卷曲尾巴的大蝎子。敌人的威胁并没有使他屈服，但又找不到谋害他的证据，只好暂时先放了他，暗中对他进行严密监视。

明知生命危在旦夕，黎·穆塔里甫并没有放下笔杆，而是更加坚定投入战斗。他以“卡依那木·乌尔克西”（汉语即激流之意）写下了许多富有战斗意义的诗篇。同时，他与当时阿克苏其

¹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49 页。

²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前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8 页。

他诗人如尼米希依提、比拉勒·艾则孜等一道在《阿克苏报》创办了文学副刊，致力于培养青年文学爱好者，扩大战斗队伍，积极从事戏剧创作和体育活动。在阿克苏他创作了《哀啸》、《学习吧，青年》、《来吧，春天》、《关于诗人的“对句诗”》、《无题》、《冥想中的探索》、《遐想》《弹唱吧，我的乐师》、《列宁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买买提——为儿童节而作》等。他还根据维吾尔族民间叙事长诗《塔伊尔与祖赫拉》编写了一部歌剧，并亲自扮演剧中的男主角。

1944年，伊犁爆发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这一斗争很快在伊、塔、阿三区取得胜利。三区革命的胜利给诗人以极大的鼓舞，他立刻与其他同志于1945年初在阿克苏建立了反对国民党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把阿克苏和其他地方的一批进步青年吸引在自己周围，按照三区革命的原则，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各种方式的宣传活动，号召人民支持三区革命，积极开展反对国民党的地下斗争，《理想的追求》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这首诗后来成为这个革命组织的战斗进行曲，鼓舞人们去战斗，告诉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机会已到，不能向任何困难低头，表达了人民的斗争意志。

正当诗人和他的战友们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由于暗藏在组织内部的叛徒出卖，他们不幸被敌人逮捕。在监狱中，诗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诗人在监狱墙上写下许多革命诗篇，可惜都没有留存下来。现在仅能找到的就是诗人当时写在狱墙上的这样两句话：

这广漠的世界对我恰似一座地狱，
万恶的刽子手使我青春的花朵枯萎。¹

1945年9月18日，诗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他年仅23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和不屈的战斗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黎·穆塔里甫生前的革命活动和文艺创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50年阿克苏地委为黎·穆塔里甫等22位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革命青年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安葬仪式，并为黎·穆塔里甫修建了纪念碑。1952年新疆人民出版社用维吾尔文出版了他的诗集《爱与恨》。195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维吾尔族诗人、翻译家克力木·霍加翻译的他的诗集的汉译本，198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文选》汉译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集团在全国推行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爱国进步的革命烈士黎·穆塔里甫也遭到无端的诬蔑和攻击，被罗致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各族民众的义愤。

粉碎“四人帮”后，黎·穆塔里甫也被平反昭雪。1979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召开大会，为诗人恢复了名誉。黎·穆塔里甫再次成为新疆各族民众敬仰的诗人。在他生命短短的23年里，黎·穆塔里甫用维吾尔文撰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未完成)，三部叙事长诗，八部剧本以及许多诗歌、散文、杂文、歌词和文学评论。他的作品从1940年开始被译成了俄文、乌孜别克文和塔塔尔文，1945年又被译成了汉文。1982年，为了纪念他诞辰60周年，用汉文、维文同时出版了汇集他全部作品的《鲁特甫拉·穆塔里甫作品集》。他的不少诗歌、散文和剧本已经被编入大、中、小学的教科书。他的精神更被后人所称颂，人们为了缅怀这位维吾尔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爱国主义斗士，后人特地创作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歌曲“Salam Lutpulla”（致鲁特富拉²），二

¹ 张世荣等编，《黎·穆塔里甫诗选·前言》，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扉页。

² 鲁特富拉·穆塔里甫，即黎·穆塔里甫的简称。为了便于汉语书写，长期以来对诗人鲁特富拉·穆塔里甫，用了简写的方式。按照维吾尔人名习惯，鲁特富拉为诗人的名字，穆塔里甫为诗人的姓。在这首《致鲁特富拉》的诗中，当代人满怀深情地用了更为亲近的表达方式，直呼其名，表达了一代又一代人民对诗人的深切缅怀。这首诗感情真挚。立意深刻，发人深省，在民间广为流传。后又被谱曲，是目前维吾尔民众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十世纪末，这首歌曲又被灰狼艾斯卡尔改编为摇滚音乐，在社会上再一次引起轰动。

作为维吾尔当代散文创作的开创者，1943年，黎·穆塔里甫在他的《她的前途光明远大》中，曾深情讴歌祖国母亲：“她有非常辽阔的国土，象一朵红花的嫩叶座落在世界的东方。她的南方是张满亚热带特产的丰饶的果园；北边有广阔的草原、巨大的河流、常年积雪的山岭和冬长夏短的地方、东边是浩淼壮阔的汪洋大海。”同时，作者更把祖国比作“一只勇猛的雄狮”。“她为了不使自己迷失在宽阔无垠的土地上，第一个发明了指南针；她为了防御毒蛇猛兽的侵袭，发明了火药；她为了使自己的千百万后代生活的更舒适、更幸福而发明了缫丝业；她为了给后代留下祖国灿烂的文化，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张。这些伟大的创举，不仅对自己的后代是永远不朽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也同样有不可估价的贡献。这是东方文明之河的源头，与发源在巴比伦、美索布达米亚、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并驾齐驱。这只雄狮的发明巨流和西方的发明巨流汇合在一起了。她的声誉，在史册上骄傲地回响着、回响着……”。

作者在散文中满含深情，描绘了祖国的美好河山。他写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历数了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宝库做出的积极贡献，礼赞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甘于奉献的精神。之后他又针对当时全国抗战的救亡形势写道：英雄的中华儿女对日本鬼子的疯狂进攻、对家园的践踏和凌辱毫不低头，最终会赢得战斗的胜利。这篇散文表达出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中华各族儿女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辱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体现了年轻诗人关心全人类和平发展的开阔胸怀和博大精神，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遗产放在全人类的高度加以认识，这是黎·穆塔里甫最值得我们敬仰之处。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无论是散文还是评论，都将中华儿女作为主人公来塑造、将中华民族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这是那个时代维吾尔族诗人共同的精神品质，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新疆精神的最好诠释。

热情歌颂新疆儿女、歌颂祖国母亲，追求人类精神是黎·穆塔里甫一以贯之的主题，他并没有站在一个狭隘的民族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华民族整体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用创作号召各族人民团结奋战，为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美好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他的诗篇恰恰代表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确立场，他不向国民党反动政府低头、不向暴力权势低头，他追求自由和真理，哪怕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体现了作者努力破除限制各族群思想和文化沟通的障碍，敢于担当重任，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民众勾勒出一个更为宏大高远的中华民族整体形象。

黎·穆塔里甫的宽阔视野和理想追求，对同时代很多维吾尔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带动和影响作用。黎·穆塔里甫同时代的诗人乌提库尔（1923—1995）不仅与他合作了戏剧《青牡丹》（1943），而且还创作了抒情长诗《渴望新中国》（1942）。20世纪维吾尔族诗人艾合买提·孜亚依在《新疆日报》工作期间，与黎·穆塔里甫同居一室，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时势和文学，虽然孜亚依比黎·穆塔里甫年长，但他对黎·穆塔里甫非常崇敬，黎·穆塔里甫诗中的战斗精神感染和教育着他，使他认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要用自己手中的笔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解放解放而奋斗。艾合买提·孜亚依此时的诗歌虽然仍保持了自己特有的抒情诗人风格，但在思想内容上却有了很大变化。他在1943年到乌鲁木齐后创作的诗歌如《与人民同欢笑》、《寻找》等诗歌，记录了他思想变化的轨迹。《与人民同欢笑》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要与人民同哭泣也一同欢乐，
在这条路上孜亚依你别无选择。¹

黎·穆塔里甫的战斗精神不仅感染了一大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被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所崇敬。著名诗人刘肖无来到新疆后，知道了黎·穆塔里甫的生平和诗作，他便开始研究黎·穆特

¹ 艾合买提·孜亚依著，《艾合买提·孜亚依作品选》（维吾尔文），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12页。

里甫，成为把黎·穆塔里甫介绍给全中国读者的第一人。刘肖无在阿克苏搜集了许多黎·穆特里甫的诗文、轶事，他写道：“工作越是深入，我越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一定要把新疆的这位著名诗人介绍给全国各族人民”。刘肖无很快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介绍黎·穆塔里甫的报告文学，同时刊出的还有黎·穆塔里甫的诗，这篇报告文学开了《人民文学》介绍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先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后来，肖三在编纂《革命烈士诗抄》时就将黎·穆塔里甫的诗选了进去。在1959年建国10周年之际，刘肖无又将黎·穆塔里甫的事迹编写成了电影剧本《远方星火》，被拍成了电影，向全国观众介绍这位年青的维吾尔族爱国诗人¹。从这些事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各族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品质和理想追求。

三. 黎·穆塔里甫思想及创作中的文化认同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从黎·穆塔里甫的思想和创作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为我们今天关于新疆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和文化发展的相关讨论提供一些思路：

第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敌、荣辱与共，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建设史，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根本。在当代，挖掘和宣传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建设史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民族优秀人物，使之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意义重大。尤其是像黎·穆塔里甫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鲁迅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他们的品格和精神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在维吾尔族民众中德高望众、具有不可替代的精神核心作用和持久的影响力，对他们的宣传，其实就是对中华民族整体精神的宣传，是中华民族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鲜活教材。

第二，纵观黎·穆塔里甫的思想和创作历程，可以清楚的看到，他是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将本民族的未来置于祖国未来的大背景中，这使他不仅是维吾尔族的精英人物，而且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国家精英。因此，我们对黎·穆塔里甫的认识，应该放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高度去理解和阐释。从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中，从思想文化先驱梁启超、鲁迅等人，包括维吾尔族年轻诗人黎·穆塔里甫或是哈萨克族诗人阿拜等人物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品质，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强烈的忧患意识，敢于担当，为了中华民族的事业宁可牺牲个人的幸福乃至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黎·穆塔里甫的精神追求并为此献出年轻生命的事迹，可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黎·穆塔里甫最值得我们敬佩的，就在于他的这颗年轻的心，是在响应祖国母亲的召唤，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而跳动。多年以来，由于他主要用本民族文字写作，黎·穆塔里甫的思想和创作使他仅仅作为一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而在维吾尔民众中广为人知、深入人心，但他的诗作并没有为全国各族民众广泛了解，这位维吾尔诗人的作品的深刻意义和文学价值并没有被真正提升到中华民族文化凝聚象征和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宝库的高度。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位诗人的创作，回荡其中的祖国之恋、中华民族精神之恋不能不使我们感动和自豪。因此，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在中国国家知识精英层次看待和解读黎·穆塔里甫的思想和创作，可以使我们对维吾尔族知识群体在20世纪的思想有一个新的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今天客观看待新疆各民族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所做的努力和追求，正体现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高度政治自觉。因此，如果少数民族中像黎·穆塔里甫这样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去思考、去行动的思想者，在中国的思想史、文学史中，应该有相应的内容介绍和宣传他们，使他们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中华民族的精英，提高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有利于彼此的对话与沟通，让各族人民从这些杰出人物及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中华民族的空前凝聚力，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确实是维系各族人民精神相同的根本，感受到代思想先驱为此做出的巨大努力，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需要我们好好珍惜，他

¹ 见新疆文化网 xjwh.xjdaily.com

们的精神更应该发扬光大。

第三，黎·穆塔里甫的思想和创作告诉我们，知识分子不仅要为真理和正义而书写、代表民众发言，更能从人类的范围来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发展。正因为黎·穆塔里甫用诗歌这样最能被群众听到的方式发出知识分子的声音，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愿望、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才能在群众中有广泛而持久的回响，代代追随。一个有崇高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不仅能面对民众、面对权势，首先还在于能面对自我，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反省自我。这是自孔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以来，自省和质疑就成为中国各民族知识分子共同的品格和特征。今天，当我们思考人文精神的缺失、有感于能与自己心灵对话的知识分子少而又少的时代，有感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已被世俗的职称、获奖、论文、课题和各种头衔填充的日益膨胀、不再有空间倾听来自心灵的质疑和反省的声音时，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内省的追求和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四，近年来世界各国天灾人祸连连不断，东亚北非战火此起彼伏，民族宗教冲突和境外势力的干预使许多国家濒临分裂、民不聊生。两相对照，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祥和的民族大家庭中，确实是我们全体中华儿女的幸福。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党中央指出新疆的繁荣发展体现了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愿望、新疆的发展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全国 19 省市援助新疆。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进程，赋予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以新的内涵，彰显了各民族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共有财富，突出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主题。这也向各民族知识分子提出新的要求，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表达人民的愿望、诉求，敢于担当、为新疆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

【书 讯】

《西藏社会发展研究》

马戎 主编

民族出版社 2011 年 4 月出版

目录

导言	马戎
人口篇	
西藏自治区人口普查分析	马戎
拉萨流动人口调查	马戎、旦增伦珠
教育篇	
西藏教育事业的历史变迁	多杰才旦
城乡居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双语现象及文化交融	周炜
藏族学校教学语言的考察与讨论	巴登尼玛
影响藏区学生入学率和毕业率因素的分析	格勒
甘南州牧区基础教育现状、困境及其建议	才旺南加、徐芳
藏族学生眼中的内地西藏班（校）	白杰瑞、班觉、阿旺次仁
经济篇	
发展经济学与西藏发展——兼议藏学领域中的经济理论研究问题	孙勇
西藏的经济形态及其变迁	马戎
西藏农牧民的收入及增收问题研究	罗绒战堆

西藏现代化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占 87%以上人口的农牧民的现代化问题 格勒
援助政策与西藏经济发展 靳薇

社会篇

社会转型与变迁：藏传佛教寺庙调查——哲蚌寺 旦增伦珠
牧区乡村的基层政权与民间制度的互动——以安多藏族牧村之实地研究为例 万德卡尔
西藏农村的社会变迁——江孜县班觉伦布村追踪调查 徐平
吉毒：巴村的记忆 陈波
建设共享文化乃民族团结之本：藏区建设之思考 巴登尼玛

本书属于民族出版社组织的《当代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精选丛书》，该《丛书》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还有：王希恩主编，《民族过程与中国民族变迁研究》，2011年3月出版。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